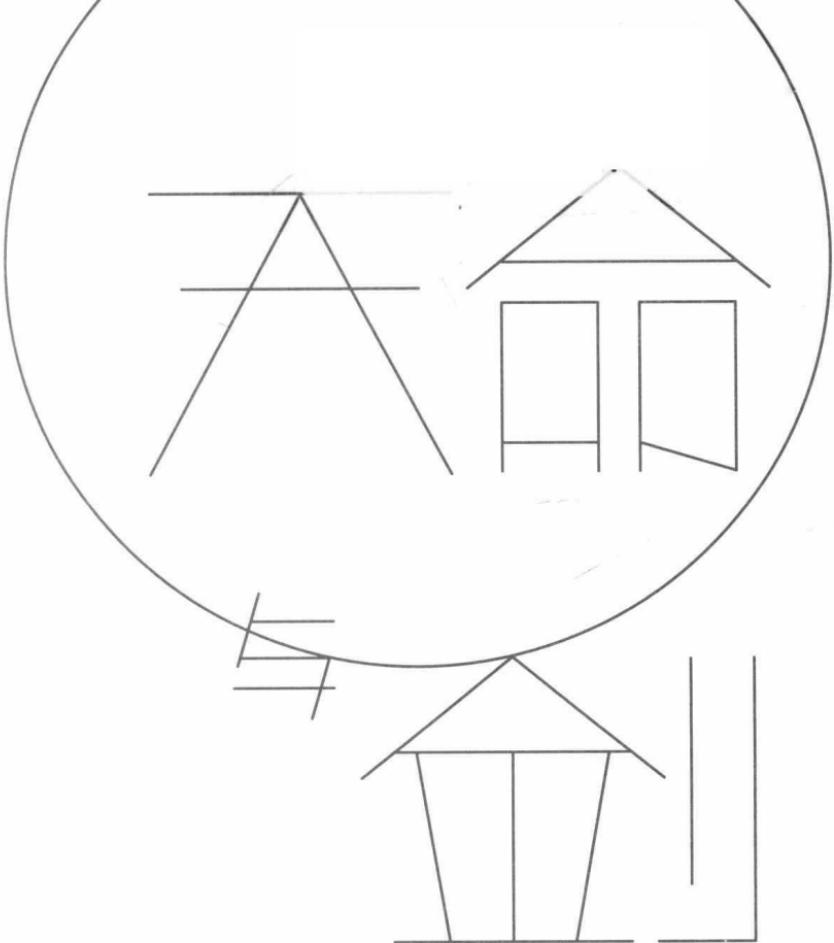


张明扬/著



帝制時代
官式建築



即
制
在
焦
的

张明扬/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 / 张明扬著 .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 2017.7

ISBN 978-7-5473-1139-4

I . ①天… II . ①张… III .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 清后期 IV . ① D6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1251 号

天命与剑

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

张明扬 著

统筹策划 彭毅文

责任编辑 彭毅文

书籍设计 typo_d

责任印制 曹毅波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136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39-4

定 价：32.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序

帝制的合法性迷思

周濂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走红之后，“有趣”就成了大众史学读物的标配，用小说的笔法写历史，以今人的视角断古人，固然常有别开生面的效果，但是类似的招数一旦用老，不但极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且也会因为脑洞开得过大开始满嘴跑火车。

但是我读明扬的作品却从不担心遇到此类“车祸现场”。他的史学文章能铺叙更长别裁，善因袭更会创作，有趣不油滑，戏说不胡说。就拿手头的这本《天命与剑》来说，如果单看小标题——“拥曹还是拥刘？”、“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克隆人完颜亮”、“康熙给韦小宝上的一堂政治课”——你会误以为这是本卖弄小聪明的历史小读物，但综观全书，探讨的却是“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这样一个需要沐浴焚香的大问题。

所谓“合法性”，如果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就是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千万不要小看“道德”的

分量，只有愚蠢如载沣者才会口出狂言“怕什么？有兵在！”，有头脑的统治者除了敢于亮剑，更善于说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大道理，以求被统治者口服心也服。但是另一方面，也千万不要高估了“证成”的效力，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足以摧毁秦始皇的合法性，让无数黎民百姓揭竿而起。

正因为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明扬才会说：“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综观中华帝制两千年，从秦始皇的“五德终始说”，刘邦的“三尺剑斩白蛇”，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的“汉贼不两立”，曹丕的“王位禅让”，苻坚和北魏孝文帝的一手硬（组织南征完成大一统）和一手软（推行汉化政策争夺“文化正统”），直到欧阳修的“正统说”、康熙的“永不加赋”以及乾隆的“贬金拥宋”……历朝历代的合法性“军备竞赛”可谓是奇招迭出。而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既甄别了各种“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异，更写出了各种“合法性焦虑”的相互影响，读后颇有打通任督二脉的畅快之感。

以《拥曹还是拥刘？》这篇短文为例，明扬告诉我们，西晋的陈寿“拥曹”，是因为“魏晋禅代”的继承关系，只有“魏”有了正统地位，晋才能自然继承正统。

而江东之晋与南渡之宋“拥刘”，则是因为“偏安王朝”同病相怜，“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最有趣的是，乾隆与反清复明的毛宗岗（《三国演义》的修订者）竟然也殊途同归，在“拥刘”问题上达成共识，那是因为“大清朝已经完成了‘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治建设”，在制度与文化上充满底气的乾隆已不屑于用“拥曹”来为本朝背书，反倒是选择“拥刘”方才显得“大中至正没有私心”。把“是什么”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讲得头头是道，不仅有把树木放大成森林的大局意识，也有从森林聚焦到树木的深描能力，对于我这种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这就是好文章的典范。

都说历史学讲求证据，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历史学的想象力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什么叫做想象力？就是在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还不止于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而且有着扎实的史料和自洽的逻辑，那它就会让你一边脑洞大开一边啧啧称是。

明扬的书就充满了想象力。孔子如果穿越到后世，他最喜欢的朝代会是哪一个？假如项羽战胜刘邦，大一统还会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吗？张无忌如果当了皇帝，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凡此种种，都是极为好玩的思想实

验。比方说，孔子如果可以穿越，明扬认为他既不会青睐大一统的秦汉唐宋，也不钟意硝烟四起的五代十国，理由是孔子痛恨乱臣贼子但又热爱思想的自由市场，在他心中，“最好的时代一定是既有统一王权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齐放”，于是乎，中晚唐的藩镇时代就是他的不二选择。这样的回答可谓“寓褒贬于叙事”，说者有心，听者会意，不着痕迹，尽得风流。

回到合法性这个主题。在《神圣家族》这篇文章的末尾，明扬写道：“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作为解构之作，明扬此书拆解的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合法性政治神话，意义重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他拆解政治神话的手法。梁启超当年批旧史学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今日观之，一个好的史学作者也许不应走到“四弊”的反题，而是要实现合题，即既知有朝廷也知有国家，既知有个人也知有群体，既知有陈迹也知有今务，既知有事实也知有理想。唯其如此，才能与历史产生“共情”与“理解”，既不因“温情”与“敬意”而走向伪饰

与护短，也不会为了“批判”和“启蒙”而变得粗暴和简单。我最欣赏明扬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是通过暴力强拆来破解政治神话，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关节与机理、政治的逻辑与机制，以无厚入有间，“动刀甚微，譟然已解”，其意自明，其理自现。

全书的压轴之作《清末的“晚明想象”》中写道，在清末的鼎革时刻，对于邹容这些反体制派而言，晚明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强调清军入关暴行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正是用来消解清廷合法性的主要著述。从客观严谨的历史角度出发，《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对史实多有夸张，说是伪作亦不为过，但是恰恰因为乾隆禁书，大肆销毁追述明亡历史的各类史学著作，以至于百年之后，他的帝国继承人面临巨大的尴尬：“既然‘真相’成了禁忌，他们又怎能拿禁忌为自己辩白呢？难道要昭告天下，有些‘更严肃的禁书’写的才是真的，扬州的有关数据是8万人，而不是80万。”

对于处于“后真相时代”的现代人而言，这个来自于“无真相时代”的警世恒言格外的振聋发聩：“这可能是乾隆没有想到的，真相固然是大清的敌人，但也是《扬州十日记》此类革命谣言的敌人。正是乾隆，尽管他预见了‘晚明历史记忆’这个帝国之敌，但也自我摧

毁了作为反制工具的真相，让后世的爱新觉罗家族只能在谣言中束手就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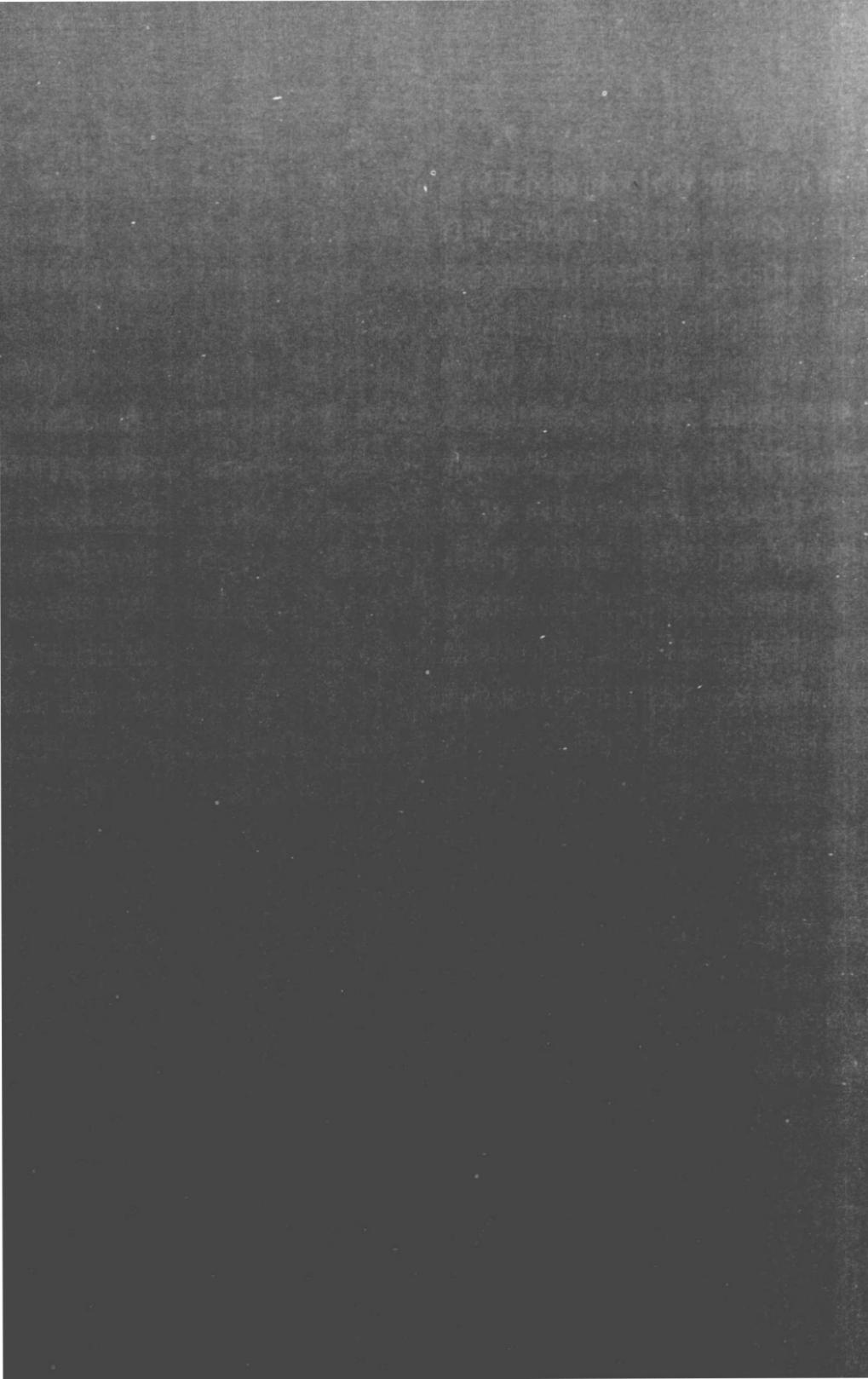
多年以前我曾经对政治合法性问题下过一些功夫，但是坦白说，由于缺乏历史学的训练，留下了不少遗憾，尤其是对帝制时代的合法性几无涉及，明扬的这本书给我好好补了一次课。辛波斯卡说，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抛出了太多的问题，却给出了太少的答案，正因如此，哲学家要为对大问题作出小回答而道歉。相比之下，明扬的这本书不仅抛出了大问题，而且还给出了大回答，所以他无需为此道歉，而我们要为此鼓掌。

目 次

序	帝制的合法性迷思···1
01 ···	每个王朝都在追求合法性···1
02 ···	神圣家族···13
03 ···	“秦灭六国”这样重要的事，要做三遍···21
04 ···	谁杀死了项羽？···35
05 ···	帝王父子政见之争背后···45
06 ···	三个皇帝的反战宣言···55
07 ···	拥曹还是拥刘？···61
08 ···	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69
09 ···	诸葛家的天下···75
10 ···	死于政治正确的苻坚···81
11 ···	大唐宫廷政变指南···87
12 ···	学习太宗好榜样···97
13 ···	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为何不拒绝女主？···105
14 ···	为何说聂隐娘放弃刺杀是对的？···115
15 ···	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127
16 ···	宋徽宗的圣君狂想···135
17 ···	科举分地域录取的终极诉求···143
18 ···	克隆人完颜亮···157
19 ···	为异族政权守节的士大夫···167
20 ···	遗民傅山的高官朋友们···173
21 ···	如果张无忌当了皇帝？···179
22 ···	晚明的国际包围圈···187
23 ···	康熙给韦小宝上的一堂政治课···197
24 ···	乾隆为何要为抗清忠烈翻案？···205
25 ···	贬金尊宋：乾隆为何数典忘祖···215
26 ···	乾隆：“东亚警察”在行动···223
27 ···	清末的“晚明想象”···231
后记	···238

每个王朝都在追求合法性

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张之洞曾和摄政王载沣有过一段有名到烂俗的对话。1909年，载沣就一个重大人事任命问政于病中的张之洞，张之洞以“舆情不属，必激变乱”为由反对，谁料这位青年亲贵此时竟说出了一句惊世名言：“怕什么，有兵在！”大感意外的张之洞其后慨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因为这句大话，这位原本以窝囊胆小著称的摄政王，被当作负面典型讥讽了那么多年。但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问题：载沣的“有兵在”为何会被张之洞当作“亡国之言”？

在中国历史的某些维度上，“有兵在”可能真是一句大实话。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军权（军事实力）几乎是所有皇帝维持统治的必要条件，对于开国之君的重要性尤甚。在中央政权崩溃的割据时代，“有兵在”更是唯一的政治正确，五代十国的大军阀安重荣也曾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但是，精通儒学的张之洞不可能不知道，在帝制时代，任何政权任何皇帝除了依靠刀剑、依靠军力维持皇权之外，

只有被普遍遵奉的政治文化规范（大多数时候是儒家式的）所支持，长期统治才得以维持，皇权才能被普遍接受。

简单地说，帝制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争夺正统的诉求，用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来说，就是合法性。用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

至于载沣说的“有兵在”，对于自恃合法性在手的皇权而言，更像是生存于幕后的威慑性力量。第一，“有兵在”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构成合法性或正统的来源，就如西方君王喜欢自称“君权神授”一样，在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中，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

第二，从政治利益上而言，如果皇帝如载沣一样将“有兵在”作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那么，任何一个像安重荣那样的“有兵者”，都有合法性来挑战皇权，这在很多儒家理论家看来是乱臣贼子前仆后继的根源。退一万步，即使皇帝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合法性的支持，他也将陷入军阀混战式的权力角斗之中，而无法安身立命。

第三，最致命的是，如果皇帝在某个时段缺乏军事实力支撑的话，为了维持统治，就更需要贬低“有兵在”的逐鹿式价值观，强调合法性和正统的重要性，才更有

可能安然渡过政治危机。讽刺的是，载沣时代的大清朝偏偏就是军权旁落，却还不重视有关合法性的“舆情不属”，无兵者反而无脑地去强调“有兵在”，这不是“亡国之言”是什么？

二

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即使是如秦始皇这样穷兵黩武的超级武力爱好者，也有自己的合法性小九九，他的主要焦虑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如何向全天下特别是新近征服的东方六国民众树立自己受命于天的神圣形象。

为此，秦始皇做了三件足以垂范后世的大事。第一，秦始皇第一个实践了“五德终始说”。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发明了这个充满神秘主义的王朝更替学说，认为王朝德运以“土木金火水”为顺序进行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按照“周为火德”的顺序，秦帝国自然应该接过“水德”的旗帜，秦始皇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找了一个先祖出猎获得黑龙的理由，接上了水德；第二，秦始皇称帝第三年，又效法古代圣王的做法，去泰山封禅；第三，秦始皇东巡途中，在各地大搞刻石活动，在刻石上以“大圣自居”，宣扬自己的圣王功德，致力于在东方臣

民中打造自己的圣人形象。用孙英刚先生在《神文时代》一书中的话说，秦始皇通过自我神圣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终结乱世的“救世主”。

到了汉代，刘邦又遇见一个新的合法性焦虑。与起源于“秦王”的秦始皇不一样，刘邦是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如何才能说服天下人他刘邦一个亭长才是天命所归？刘邦的选择是制造政治神话，一方面声称自己是母亲与赤龙梦中出轨而生，一方面又打造了自己作为“赤帝子”“三尺剑斩白蛇”的神话，从而给自己穿上了天命所归的神圣外衣。

面对汉帝国内部“东西方”（山东与关中）文化冲突的局面，刘邦及之后的文帝、景帝一直执行着“郡国并行”的二元体制，以避免重蹈秦帝国因文化统合不力而翻车的覆辙；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统”学说，汉帝国以“独尊儒术”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统合的终级目标。

顺带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进一步强化了汉武帝政权的天命色彩。

西汉末年，王莽登上历史舞台。从本质上来说，王莽篡汉正是迎合了汉帝国内部一种合法性焦虑：为何不能彻底告别秦政，复古（周制）走儒家原教旨主义之路。代表了汉代士大夫集团共同政治理想的王莽登基后展开